

選民的黨派選擇： 態度取向及個人背景的分析

胡 佛・游 盈 隆

一、概 論

選舉是一場政治競賽，而由選民對參選的候選人作最後的裁決與選擇。這樣的選擇不僅可促使民意代表或其他公職的當選人必得以民意為依歸，且可導致政治衝突的和平解決，而達到民主生活中所謂的「動態的和諧」（註一）。但這一和諧的歷程如不能容納不同意見的政治團體及候選人參與競爭，換言之，如不能具備公正的競賽規則，則不為功。在實際上，選民亦必須由政治團體提供候選人，以及由候選人推薦自己，否則，即難作選擇。因之，選舉的競賽不能無政黨的運作，而在民主的國家，政黨的主要功能即在參與選舉，贏取選舉。

政黨與選舉在民主生活中所形成的密不可分的關係，使得研究選舉行為的西方政治學者，無不探討政黨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但其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則在選舉行為的理論建構。一般說來，西方民主國家多具政黨政治的傳統，尤以美國的兩黨政治為最，因之，美國的政治行為學者往往視交互執政的政黨政治為當然，而可輕易地將選舉看成政黨之間的競爭，縱然在觀點上有異。在一九四〇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 Paul F. Lazarsfeld 等（1944）雖着重選民投票行為中所反映出的社會特質，

但也強調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其後的學者，特別是密歇根大學的 Angus Campbell 等（1954；1960），則認為政黨認同在所有投票態度的取向中，最具長期持續的穩定性，而視作選舉行為的核心觀念，一方面建立選舉與政治秩序的理論（註二），一方面發展因果關係的理論模型（註三）。他們雖也重視選民的政見取向及候選人取向，但祇看成短期的影響因素，不認具有太大的作用。Lazarsfeld 等學者對政黨認同的強調，近年來，曾受到若干學者的非難。如 V. O. Key (1966) 即指出為數頗多的選民是取向於候選人的政見而投票，所以是「負責的選民。」其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政治問題對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愈來愈大，而政黨認同則有減弱的趨勢（參見：Miller, Miller, Raine, and Brown, 1967；Schulman and Pomper, 1975；Abramson, 1975；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

美國政治學者對政黨認同的爭論，主要在這一取向是否確實具有長期持續性的絕對影響力，而能供作投票理論的核心觀念。但在實際上，美國選民投票的政見取向雖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節節上升，但仍落在政黨認同之後，且以總統的大選為主（參見：Pomper, 1975：186-209）。在美國國會議員的選舉，選民所取向的政黨認同，則一向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參見：Niemi and Weisberg, 1976：161-175）。政黨認同是一種對政黨的習慣性感情傾向，美國選民所產生的這種傾向當然與穩定的兩黨政治傳統息息相關。因之，我們從政黨認同在美國選民投票取向中所居的優勢地位可知，美國學者不僅在投票的理論上，無法擺脫傳統的兩黨競爭的政黨政治，而且所有的爭論，也仍然要在這一政黨政治的基礎上進行。

與美國的民主政治相較，我們一方面欠缺兩黨運作的政治傳

統，另一方面尚在試建可導致所謂「動態和諧」的選舉規範，因之，我們對我國選民投票行為的觀察，雖可參考美國學者的一些基本概念與途徑，但在理論的建構上，則必須按我國選舉的特性，發展自己的架構。本文主在探究我國選民對黨派候選人的選擇，重點則在理論的試建，在這方面我們具有一些基本的看法：

(一)如前所述，美國學者儘管對政黨認同的理論建構有各種爭論，但皆有意或無意地站在兩黨運作的傳統政治結構上進行。政黨長期認同的理論基礎，固然來自傳統的政黨政治，而節節上升的政見取向，在理論上所強調的，仍不出兩黨政治的所謂自由與保守的傳統。換言之，前者所着重的是政黨的感情傳統，後者則在政策傳統。我國既欠缺兩黨運作的政治傳統，在選舉中，無黨籍的候選人也無法作一般政黨所習用的感情或政策傳統的訴求，所以我們在觀察時，即不能以政黨認同作為理論架構的重心。實際上，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胡佛，游盈隆，1983：9-12），政黨認同也並非是我國選民的主要投票取向，且遠落政見取向及各項候選人取向之後。我們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美國的選舉是傳統兩黨政治的運作過程，因而美國學者所着重探究的乃在這一具有穩定傳統的政黨體制內 (*within the system*) 的選舉理論；而相反地，我國的選舉則相當程度地可能成為推動現代政黨政治的過程，所以我們所要着重探究的應是建構政黨體制本身的 (*of the system*) 選舉理論。我們要從選民的投票取向進而觀察候選人的類型，換言之，我們要看不同政治背景的候選人是否受到，以及受到，那一類或那幾類選民的投票取向的支持。以無黨籍的候選人來說，如多數受到某類（或數類）取向的普遍支持，則在選民的心目中，已具有實質政黨的形象，而對未來的政黨政治即構成一推動的力量；否則，即是政治現況的持續。

(二)美國學者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必然具有根源。我們過去即曾指出（胡佛，1982：119-120），政黨認同可能來自選民對政見問題的贊同，也可能出於對政黨人士的偏愛。Jerrold G. Rusk (1982：91-96)近亦指稱，密歇根大學的 Campbell 教授等一面誇大了政黨認同的重要性，一面也低估了問題取向的影響力；而所謂的政黨認同不過是問題或候選人取向的代替物而已。在傳統的政黨體制下，美國選民的認同傳統與政策傳統可能易於合致，而不易分辨，但如 Rusk 等學者則仍主張細加辨識，作為重建理論的基礎。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在投票決定上，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並不具重要的影響力，我們當然更要注重政見及候選人取向在我們的理論探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三)美國學者近年來雖着重選民的問題或政見取向，也發覺問題的要素不易辨認與解答（註四），但並未在概念上就問題的政治特性，加以分劃。大致上，他們所重視的問題多屬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就是所着重的是體系內 (*within the system*) 的決策及執行的功能，未能擴展到體系本身的 (*of the system*) 認同及規範結構。這可能是美國的民主政治體系，長期以來，已奠定相當穩固的基礎，而不發生政治認同及政治結構上的問題。但我國正從一個傳統性的權威政治體系轉向到民主的政治體系，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功能性的政策制定與執行，而更嚴重的是認同性的整合與結構性的規範。選舉的實施，本身就是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演進，而非僅是體系功能運作的過程。但其中所呈現的問題則牽涉到體系本身的整合與政黨政治的發展，因之，我們須建立包括認同、結構及功能在內的整體體系的概念架構，以觀察選民對黨派候選人的選擇。

四與政黨認同相似，選民對候選人的偏愛，也必然具有原因

。我們可以把這些原因看成候選人對選民的吸引力，一一加以列舉，但這在探究政黨選擇與發展的理論上，尚不濟事。政黨政治的發展常環繞着政治的課題，也就是關係到前述的三類政治問題，因之，我們在觀察候選人各種吸引力時，必須進一步辨識其中所含的特性，主要在政治性的或非政治性的。如選民對候選人的遭遇或胆識表示同情或欣賞，我們即必得加以分辨這些偏愛究竟是來自候選人的個人特質或私人境遇，還是受激於某些政治事件，否則，對政治發展的觀察，即不易周延及深入。

(五)對選民的黨派選擇及所具的政治意義的探討，我們當然也應注意到選民的個人因素與社會背景。美國學者 Lazarsfeld 等(1944)過去對投票行為的探究，即很着重社會理論，曾綜合選民的經社地位、宗教信仰與居住地居等三項變數，建立「政治傾向指標」(Indexes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用以觀察投票行為。但這一途徑很明顯地忽視了選民的態度取向從中所發生的中介作用，Campbell 等(1954；1960)乃指稱這一以社會階層為主的指標與投票決定之間所具有的關連，不過是虛假的相關，而主張以心理的取向相輔。我們的看法是：社會階層的實質意義不應是某類特殊身份的人的聚結，而是所具共同生活經驗與價值的結合。因之，我們不妨就選民社會生活上的關係，察看在投票決定上是否形成一種價值取向。這樣就可以將生活經驗與態度相連結，可能更易顯示出社會背景在政治發展上的意義。當然社會生活也可分成政治性的及非政治性的，我們在探究時，也應加以辨識。

根據以上的看法，我們覺得對選民的政黨選擇的觀察，應以政治體系，特別是政黨政治的運作與發展為理論架構的基礎，然後再將選民的投票決定分劃為個人的及態度取向的兩大類。在態度取

向中，可續分政治的及非政治的，並將政見取向、候選人取向及社會生活的關係取向等，各按所具的特性，分別加以劃歸。我們所觀察的對象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所舉行的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中的台北市選民。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如前所述，我們將選民的投票決定劃分為個人背景及態度取向等兩大類。在個人背景方面，我們所觀察的是選民的性別、年齡、省籍、教育、職業等變項對選民投票決定的影響。我們認為知識程度在個人的背景中，最能影響選民的態度，所以除單獨分析外，並在性別、年齡及省籍的變項中，再加控制，作進一步的分析。

在態度取向方面，我們先劃分為政見取向、候選人取向及關係取向等三類，然後再按政治及非政治的特性，逐一觀察其中所包含的各項變項與選民投票決定之間的關係。現將三類的各項變項，分述如下：

(一)政見取向：

我們針對整體政治體系的問題，分成三種取向：(1)認同取向；(2)規範取向；(3)政策取向。每一種取向皆包括若干問題，構成一政見取向的量表。

(二)候選人取向：

共包括七項：(1)由於品德；(2)由於過去的表現或成就；(3)由於所經歷的遭遇；(4)由於家世；(5)由於學識；(6)由於敢作敢當的勇氣（胆識）；(7)由於風度。

我們另針對候選人的表現或成就、所經歷的遭遇及敢作敢當的勇氣，製作量表以測量其中的政治性及非政治性的投票取向。

(三)關係取向：

共分為五種，每種再包括若干項，現分述如下：

(1)私人關係取向：共包括四項：①由於家人或親戚的囑託；

②由於朋友或同學的囑託；③由於師長或長輩的囑託；④由於鄰居的囑託。

(2)社會關係取向：共包括五項：①由於所服務機關同事的囑託；②由於所參加團體會友的囑託；③由於是同鄉；④由於是同宗；⑤由於是校友。

(3)黨政關係取向：共包括五項：①由於黨團組織的囑託；②由於是同黨黨員；③由於是無黨籍人士；④由於後備軍人組織的囑託；⑤由於里鄰長的囑託。

我們所運用的方式是訪談：先請受訪者據實說明那一項或那幾項因素影響自己的投票決定，然後再請排列這幾項因素的重要次序。受訪的選民可作一項或多項選擇，也可作同等次序的排列。如須進一步回答量表的問題，如政見取向，我們就請受訪的選民在所選擇的政見取向中，繼續請說明是贊成那一項或那幾項候選人的政見。

我們採用二段抽樣法（Two phases sampling）共抽取台北市選民樣本計九五四人，並在民國七十年二月中旬作逐戶訪問。在九五四人的樣本中，投票樣本計七五四人（另不投票樣本一八三人，無效樣本一七人），此即為本研究的樣本總數。有關抽樣的方法及量表的編製與測量等，請參見附錄一及二。

我們根據所抽取的樣本，分別就選民的個人因素及態度取向，計算所含各種變項的次數及百分比，以供進一步的分析，所得的數據請參見附錄三及四。

三、態度取向與黨派選擇

選民對黨派選擇的態度取向，如前所述，可分成政見取向，候選人取向及關係取向，現分別加以討論如下：

(一)政見取向與黨派選擇：

我們在前面曾經強調，對選民政見取向的探究，應根據整體政治體系的概念，分別就認同、規範及政策等三個層面，建立理論的架構，加以觀察及驗證。我們在這樣的觀念下，再對執政的國民黨及無黨籍或黨外的立委候選人所發表的政見，進行內容分析，並從中抽繹出十九項問題，在概念上作進一步的充實與歸類。我們將政策取向涵蓋一般性的公共政策及執行的能力，另將規範取向及認同取向再作劃分。規範取向分為相對的規範改革與系統安定兩類；認同取向分為相對的國家認同及地域認同兩類。經過這樣的充實與分類後，我們乃編製強度的量表（參見附錄二），並假設上述的五種取向（公共政策、規範改革、系統安定、國家認同、地域認同）皆能各自構成一個類型。我們的假設經用相關分析及因素分析，皆能加以證實（胡佛，1982：147-152）。現將因素分析所獲得的五個類型因素或綜合取向，列如表一。

上述政見取向與選民的黨派選擇究具怎樣的關連？執政黨與黨外的選民又具有怎樣的政見取向？再進一步看，這些選民對執政黨及黨外在政見上究具有怎樣的主觀寄望與期待？我們的探究分成兩個部分：(1)先檢驗執政黨與黨外的選民係同等地重視政見取向，或有所輕重、差異；(2)根據前述的五個政見類型，檢驗執政黨及黨外選民在類型取向上，有無異同。現即就此兩部分加以分析：

(1)根據我們的發現，政見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不具有顯著的關聯 ($X^2 = 0.034$, d.f = 1, $p > .05$)。換言之，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並不比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具有更強烈的政見取向。反之，亦然。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候選人政見而投票的，約五分之二強（41.59%）；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政見因素而投票的，亦約占五分之二強（42.57%）。由此可知，兩者皆同等重視政見，在程度上並無明顯的差異存在；至於兩者在取向的內涵上具有怎樣的異同，我們將在下面討論。

(2)如前面所曾特別提到的，我國正處於轉向民主政治體系的過程中。因之，如據我們的理論架構，選民的政見取向，在黨派的選擇上，可能提升到體系本身的認同與結構的有關問題，而不像西方民主結構穩固的國家，祇着重政策問題的差異。我們特設五種假設，以驗證我們的理論：

- I. 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 II. 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規範改革取向上，具有顯著的差異：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因這項因素的影響而投票。
- III. 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因這項因素的影響而投票。
- IV. 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因這項因素的影響而投票。
- V. 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具有顯著

表一：政見取向的因素分析（正交轉軸）

變 數	一般規範系統國家地域共同性						h^2
	政策取向	改革取向	安定取向	認同取向	認同取向		
大量興建廟宇，使住者有其屋	0.790	0.091	0.031	-0.032	0.008	0.6345	
妥善照顧退除役官兵，後備軍人及軍眷生活	0.724	-0.053	0.078	0.108	0.013	0.5446	
提高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0.714	-0.061	0.095	0.144	-0.062	0.5472	
實施全民失業及醫療保險，加強社會福利	0.677	0.098	0.148	0.039	-0.003	0.4917	
縮短貧富差距，改善中低收入民衆生活	0.635	0.268	0.084	-0.030	-0.121	0.4981	
澄清吏治，肅清貪污	0.517	0.183	0.328	-0.196	0.244	0.5066	
放寬言論尺度，爭取言論自由	0.090	0.752	-0.144	0.008	0.090	0.6026	
建立制衡力量，防止政治腐化	0.091	0.656	0.133	-0.117	0.044	0.4726	
改善審判的公平、獨立，以確保人權	0.148	0.628	-0.160	-0.007	0.241	0.5000	
反對官僚政客的政治特權	-0.111	0.571	0.316	-0.146	0.066	0.4644	
維持社會和睦，嚴禁不當言論	0.086	0.089	0.703	0.062	-0.130	0.5294	
集中政治權力，強化行政效能	0.169	0.021	0.696	0.246	0.010	0.5745	
維護社會秩序，反對暴力政治活動	0.387	-0.057	0.627	0.157	0.105	0.5814	
擁護政府，光復大陸	0.091	-0.097	0.163	0.727	0.067	0.5771	
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0.027	-0.001	-0.056	0.684	-0.134	0.4894	
鞏固領導中心，維護政治安定	0.014	-0.177	0.318	0.581	0.017	0.4724	
提高本省同胞的地位與榮譽	-0.037	0.043	-0.117	-0.053	0.786	0.6377	
全面擴大政治參與，增加民意代表的選舉名額	-0.028	0.268	0.099	-0.010	0.760	0.6604	
依據情勢，逐步實現民主	0.199	0.451	0.218	0.465	-0.131	0.5244	
固有值 (Eigenvalues)	3.075	2.177	1.890	1.751	1.416		

N = 244

□ → 0.50 以上

的差異：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因這項因素的影響而投票。

對以上各項假設的驗證，我們運用在因素分析中所獲得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s），作變異量的檢定，各項F值可見表二。

我們從表二的各項變異量檢定，可作以下的數點討論：

(1)一般政策的類型取向，共包含有六項政見變數：①大量興建國民住宅，使住者有其屋；②妥善照顧退除役官兵、後備軍人及軍眷生活；③提高軍公教人員的待遇；④實施全民失業及醫藥保險，以加強社會福利；⑤縮短貧富差距，改善低收入民衆生活；⑥澄清吏治，肅清貪污。這六項政見變數的基本性質，皆與政治體系的基本結構或認同的問題無關，而屬於所謂政治體系功能性的產出（output）（胡佛，1982：126）。我們從表二的變異數分析可知，在一般政策的類型取向上，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之間並無差異存在（ $F = 0.002$, $P > .05$ ）。這項發現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即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一般政策的層次上，並沒有顯著的態度歧異；換言之，二者之間的政治衝突，並非在一般政策的層次。

(2)規範改革的類型取向，是由五項政見變數所構成：①放寬言論尺度、爭取言論自由；②改善審判的公平與獨立，以確保人權；③建立制衡力量，防止政治腐化；④反對官僚政客的政治特權；⑤依據國情，逐步實現民主。關於這項因素的基本性質，根據表二的變異數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規範改革取向上，具有極顯著的差異（ $F = 42.09$, $p < .001$ ）；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很明顯地傾向規範改革，而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則相反地並不傾向這類改革。

表二：黨派選擇與五項政見類型的變異量分析（F 值）

	國 民 黨			外			總平均數	F 值
	平 均 數	標準差	平 均 數	標準差	總 平 均 數			
一般政策取向	-0.1237	1.0307	-0.1316	1.143	-0.125	0.002		
規範改革取向	-0.2268	0.8933	0.9211	1.4215	-0.0388	42.09***		
系統安定取向	0.0567	1.1114	-0.1316	0.8111	0.0259	.986		
國家認同取向	0.1546	0.9905	-0.6802	0.9893	0.0172	22.799***		
地域認同取向	- .1392	0.9797	0.5000	1.31	-0.0345	12.004***		
n = 197	83.62 %	n = 38	16.37 %					

N = 232 *** p < .001

這項發現，強而有力地證實了我們的假設。我們由此亦可證知，目前執政的國民黨與無黨籍人士之間的政治衝突，是環繞在憲政規範的改革上的。從整體政治系統的觀點看，這項衝突是基本結構性的衝突；在這個層次上，體系成員之間若呈現嚴重地態度歧異，政治過程將會充滿緊張與不安的氣氛，政治體系的安定也會受到根本的威脅。政治學者 V. O. Key (1961 : 39-53) 曾指出，除非政治體系的成員，對基本的憲政規範具有共識，否則憲政即不易維持。執政的國民黨與無黨籍人士的選民缺乏此種基本的政治共識，正是目前政治過程中滋生緊張的主要根源。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基本政治價值的歧異，並不僅限於政治菁英之間，同時也表現在選民大眾之間，這不僅會昇高政治衝突的層次，也會擴大政治衝突的範圍。因之，妥善地化解這種衝突，應是促進政治安定與發展的緊要途徑。

(3)系統安定的類型取向是由三項政見變數所構成：①集中政治權力，強化行政效能；②維持社會和諧，嚴禁不當言論；③維護社會秩序，反對暴力政治活動。這三項政見變數的共同特性就是維護政治的現狀，反對任何急劇的變革。我們從表二的變異數分析可知，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F = 0.986$, $p > .05$)。這項發現，拒斥了我們的假設：即國民黨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會有差異。

一般說來，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站在政治安定與社會秩序的立場，主張限制言論自由、反對政治暴力，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國民黨所強調的政治價值，即是維持既存的政治結構，鞏固團結，主張戒嚴時期的有限度的言論自由，並譴責政治暴力。至於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所追求的政治價值，主要固然是政

治民主與人權的保障，但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需求政治的安定。我們從表一的因素中也可看出，「依據國情，逐步實現民主」的政見變數，在各項類型取向上所得的因素分數呈現著分散的狀態，並不集中在某一特定的類型。

(4)國家認同的類型取向主要包含三項變數：①擁護政府，光復大陸；②鞏固領導中心；維護政治安定；③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這項因素的基本性質相當明確，即在強調效忠政府，謀求政治安定，反對急劇的政治改革，以及支持政治體系的近程及長程目標；其中實蘊涵着相當程度的國家主義的情緒。總歸而言，即是對國家的認同。根據表二，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之間，在這一類型取向上，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 ($F = 22.799, p < .001$)。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較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基於國家認同的因素而投票。這項發現也證實了我們的假設。認同的共識是政治體系整合的基礎，如在這方面發生衝突，不僅會影響到民主規範的建立，甚至會加深體系統合的裂痕。我們的發現實揭示了當前政治體系最根本的問題，以及所隱藏的政治危機。我們應如何妥善地化解，將是我國政治史上最嚴肅的課題。

(5)地域認同類型取向主要是由兩項政見變數所構成：①爭取本省同胞的地位與榮譽；②全面擴大政治參與，增加民意代表的選舉名額。這項因素的基本性質，一方面在於試圖改變當前權力結構的模式。另一方面，則顯示出在當前的政治體系中，有部分成員具有強烈的地域認同的感情。

根據表二的變異數分析，我們發現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這一類型的取向上，具有極顯著的差異 ($F = 12.004, p < .001$)；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很明顯地在

這一取向上，高於國民黨籍的候選人。換言之，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的投票，相當程度地是基於對台灣的認同感，或受這項因素的影響。反之，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則較少受此影響。這項發現也證實了我們的假設。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如地區民衆在權力上感受壓抑而爭取自主，以達成地域認同感情的滿足，當然會增長地域觀念的衝突，影響體系的整合。因之，國民黨籍候選人與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這方面的差異，實已涉及政治體系的根本，也再次揭示了在認同上另一面的危機。如何逐漸改善目前國會的特殊權力結構，一面化解地域觀念的隔閡，一面增強內部的整合能力，將是未來政治發展上的嚴重考驗。

我們從以上各點的討論可以發現，在政見取向上，無論國民黨籍候選人或無黨籍候選人，皆具有特定政見取向選民的支持。換言之，在選民的觀念中，政黨競爭的政治運作，已很鮮明。選民的這類特定取向應有助於未來政黨政治及民主政治的發展；但在另一面，我們由黨籍及無黨籍選民的政見取向中，又可發現若干衝突，且非在體系內(*within the system*)的一般政策，而在體系本身(*of the system*)的結構與認同，這些根本的問題如不能化解，可能反會影響到未來民主政治的進展與政黨政治的確立。

(二) 候選人取向與黨派選擇：

在黨派選擇上，我們對候選人取向的觀察，主要在探究選民是否對國民黨籍及無黨籍候選人本身的特質具有某種固定類型的偏愛，而能有助於政黨政治的發展；在另一面，則在探究國民黨籍及無黨籍候選人對選民究具有何種吸引的力量。現將候選人取向再分劃為成就取向、品德取向、學識取向、風度取向、膽識取向及同情取向等數項，逐一加以分析。

(1) 成就取向與黨派選擇：

就選民投票態度的成就取向看，這一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並無顯著的關聯 ($\chi^2 = 3.019$, $d.f = 1$, $p > .05$)。換言之，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與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成就取向的投票態度上，並沒有呈現顯著的差異。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候選人過去的表現或成就而投票的，佔 43.72 %；而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這項因素而投票的，則佔 34.34 %。由此可知，雖然在統計上，此兩項變數雖無顯著的關聯性，但從整體的趨勢看來，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比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重視候選人過去的表現或成就。

(2) 品德取向與黨派選擇：

選民投票的品德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根據我們的發現，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 ($\chi^2 = 7.583$, $d.f = 1$, $p < .01$)；亦即票選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遠比票選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注重候選人的品德。我們從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對候選人品德因素的考慮而投票的，佔 26.96 %，而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這項因素而投票的，僅佔 14 %。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比較重視候選人的改革取向及敢作敢為的態度，這可能使得他們較不在一般品德上，加以推敲。

(3) 學識取向與黨派選擇：

選民投票的學識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根據我們的發現，並不具有顯著的關聯 ($\chi^2 = 3.716$, $d.f = 1$, $p > .05$)。換言之，不論是投票支持國民黨或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學識取向的投票態度上，並未呈現顯著的差異；但從整體的趨勢看來，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較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稍重候選人

的學識因素。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國民黨候選人的選民約有五分之一強（21.6%），會考慮候選人學識的因素而投票；但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考慮這項因素而投票的，則僅有13.13%。

(4) 風度取向與黨派選擇：

選民投票的風度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根據我們的發現，並無顯著的關聯 ($\chi^2 = 1.507$, d.f = 1, $p > .05$)。我們從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對候選人風度的考慮而投票的，佔12.27%；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當中，考慮這項因素而投票的，亦佔8%。換言之，兩者對候選人的風度，如言談舉止的重視，並無顯著的差異。

(5) 同情因素與黨派選擇：

根據我們的發現，同情因素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關聯 ($\chi^2 = 26.878$, d.f = 1, $p < .001$)。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遠較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於因同情候選人的遭遇而投票。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因同情候選人的遭遇而投票的，僅佔3.76%；但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基於這項因素而投票的，則佔16.83%。根據我們的觀察，同情票的意義與性質相當地複雜，可再分成政治性的同情票與非政治性的同情票，並且同情票的政治意義高於非政治的意義（胡佛、游盈隆，1983）。由此可知，對於那些基於同情心而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我們不可單純地說成他們都是來自缺乏政治意識的無知選民；相反地，這類選民具有相當的政治意識。

(6) 胆識取向與黨派選擇：

胆識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根據我們的發現，具有極顯著的

關聯 ($\chi^2 = 16.26$, d.f = 1, $p < .001$)。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傾向基於候選人勇於批評時政的因素而投票，所以也具有相當的政治意識。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僅有 7.91 % 是因為欣賞候選人敢作敢當的勇氣而投票；但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則有五分之一強 (21%) 是基於這項因素而投票。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取向於候選人的政治特質，如政治遭遇及政治勇氣等，此在實質意義上，即是另一型具有感情內涵的政見取向；在另一面，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則較取向於候選人非政治性的本身特質。但兩者皆具有相當固定取向的選民，使得政黨競爭的形象，趨於明顯。

三關係取向與黨派選擇：

我們對選民社會生活的關係取向，共劃分為私人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等三類，每類再分數項，最後共得十四項關係取向（參見附錄二），用以施測；但在此十四項中，所取向的選民大多皆在三十以下，所佔百分比甚低，且無法作卡方檢定。其中超過三十，而列在前十名次序中的，僅有三項，即：①黨團組織的囑託（即政黨動員）；②家人或親戚的囑託；③由於是同黨黨員（即政黨認同）。由於無黨籍人士並不具有正式政黨的背景，故政黨動員及政黨認同祇能對國民黨的選民具有影響，而不能作有意義地相對比較，故不在此分析。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所能討論的祇有家人或親戚的囑託，亦即家族取向的一項，現析述如下：

根據我們的發現，選民的家族取向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性 ($\chi^2 = 7.364$, d.f = 1, $p < .01$)，亦即投票支持無黨籍人士的選民遠比票選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易受家

族因素的影響。我們從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約有五分之一（20.41%）是受到家人或親戚的囑託而投票的，而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中，則僅有約十分之一（10.69%）是受到這項因素的影響；此外，在所有因家人或親戚的囑託而投票的選民中，約四分之三（74.68%）投給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僅四分之一（25.32%）投給無黨籍候選人。為何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會比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更易受家族因素的影響？我們的看法是：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有一大部分為基層的選民，他們的教育程度較低，也較重鄉土的觀念與關係，因而也較易受家族因素的影響（游盈隆，1982：261～262；胡佛、游盈隆，1982：42）。相對地，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則較多中產階層的選民，所以較不受家族因素的左右。

但從整體看來，除家族取向外，其他個人及社會關係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影響皆不大。

四 綜合分析：

根據以上對各種態度取向的分析，我們可對國民黨或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所具有的態度取向作一較完整的觀察。這可分兩方面加以說明：

(1)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方面：根據上述的發現，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當中，以基於候選人過去的表現或成就的因素而投票者最多（佔43.72%），其次是候選人政見的因素（41.59%），以下依次是候選人的品德（26.96%）、學識（21.6%）、候選人的風度（12.27%）、家族取向（10.69%）。我們也可以說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最重要的態度取向是非政治性的候選人取向，其次是政見取向，第三是關係取向；而其他如候選人膽識、情緒性因素、家族因素、同情因素等具

政治特性的候選人取向，對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來說，影響力皆微不足道。

(2)在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方面：從上述的各項發現中可知，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以基於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見而投票者佔最多數(42.57%)，而基於候選人過去的表現或成就的因素而投票者居次(34.34%)，以下依次是候選人敢作敢當的勇氣(21%)、家人或親友的囑託(20.41%)、同情候選人的遭遇(16.83%)、候選人的品德(14%)、學識(13.13%)、風度(8%)。在以上各項因素中，尤其以初級團體的影響、候選人膽識、同情因素等項與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具有極大的差異。綜合說來，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的最重要的態度取向是政見取向，其次是具政治特質的候選人取向。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一般說來，除了候選人的成就與膽識之外，相當不重視候選人其他非政治性的特質，如品德、學識、風度等等，這是與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主要不同之處。除了候選人政治特質的取向之外，家族的初級團體的囑託，是影響無黨籍候選人選民的第三項重要因素；這類性質的取向，在性質上仍是一種「從衆的投票」，只不過從衆的對象並非政黨組織，亦不是非正式的政黨組織，而是面對面的初級團體，即家人或親友。這也與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有異。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可得兩點初步的結論：①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主要是基於政治性的因素；非政治性因素僅具有次要的影響；②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主要也是基於政治性的因素；但非政治性的因素，亦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四、個人背景與黨派選擇

(一)性別與黨派選擇：

選民的性別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連可見表三。

表三：教育、性別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檢定

		高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低等教育程度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選 擇	國 黨	147	87	104	97	54	84
	民 黨	62.01	37.99	51.74	48.26	39.13	60.87
	無 黨	96.47	96.67	81.89	86.61	76.06	78.50
	外 部	23	3	23	15	17	23
		88.46	11.54	60.53	39.47	42.50	57.50
	總 數	13.53	3.33	18.11	13.39	23.94	21.50
		170	90	127	112	71	107
$\chi^2 = 7.154$		$\chi^2 = 0.990$		$\chi^2 = 0.147$			
χ^2		$d.f = 1, p < .01$		$d.f = 1, p > .05$		$d.f = 1, > .05$	

N = 677

根據我們的分析，性別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聯未能達到顯著的水準 ($\chi^2 = 2.094, d.f = 1, p > .05$)；這說明女性與男性選民在黨派選擇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進一步的分析則顯示，在男性選民中，投票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為 82.83%；在女性選民中，則為 86.62%。而男性選民投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為 17.17%

%，女性選民則只有 13.38 %。此外，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52.78 %是男性，47.22 %是女性；但在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男性佔 60 %，女性則僅佔 40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女性選民似仍較男性選民趨於保守；一般說來，婦女選民的投票，似有支持既成優勢政黨的趨向；而新興的少數黨或政治團體，不論是左派或右派，在發展初期較難獲得多數婦女選民的支持。性別的差異所呈現的政治取向的不同，其中原因究為何？從比較政治的觀點看，這種現象似乎具有超越時空的某種規律性的存在，其構成的原因復為何？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研究歐陸各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學者指出，宗教是促使婦女選民趨向保守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像 Aitkin 及 Kahan (1974 : 457) 則從教育、所得與年齡等變數來解釋此一現象。他們認為，婦女壽命一般較男人長，教育程度則較低，工作也較少，因此收入偏低；而這些因素對婦女選民的黨派偏好具有重大的影響。教育誠然是影響選民黨派選擇的強而有力的變數，但對這種影響的瞭解，若不能作進一步的分析，恐仍不能得其詳。究竟是何種教育程度的婦女選民會較支持或排斥新興的少數黨或政治團體？根據我們在表三的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的婦女選民愈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而教育程度愈低的，愈傾向於支持無黨籍候選人。這在男性選民方面，也有同樣的傾向。從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在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選民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96.97 %，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佔 3.33 %；在中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選民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86.61 %，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佔 13.39 %。在低教育程度的婦女選民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78.5 %，而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佔 21.5 %。從這些分析看來，教育程度愈高的婦女選民，反而愈保守，愈排斥新興的、標

榜改革的無黨籍人士。在男性選民方面，情況亦復如此。我們現可對各黨派支持者再作一內部的剖析。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具高等教育程度的，男性選民佔 62.01%，女性佔 37.99%；具中等教育程度的，男性佔 51.74%，女性佔 48.26%；具低教育程度的，男性佔 39.31%，女性佔 60.87%。在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具高等教育程度的，男性佔 88.46%，女性佔 11.54%；具中等教育程度的，男性佔 60.53%，女性佔 39.47%；具低教育程度的，男性佔 42.5%，女性佔 57.5%。比較這兩組各個不同教育程度的支持者，我們可從男女的比率可知，在中等教育程度及以下的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女性超過半數以上（53.39%）；而在同等教育程度的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女性也趨近半數（48.7%）。這項資料顯示，僅從政治態度的保守或激進，並不能解釋婦女的投票取向。根據我們對性別與政見取向的分析（游盈隆，1982：203-217），教育程度愈高的婦女選民愈傾向於根據候選人的政見投票；反之，則愈傾向於其他非政見因素而投票。此外，在性別與家族取向的分析上，也發現因家族因素的影響而投票的，女性佔 70.45%，並且教育程度愈低的女性選民，愈容易受家族因素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對於泛文化研究中婦女較傾向於支持既成優勢政黨的現象，提供另一種觀點的解釋，即：教育程度愈高的婦女，較傾向於因政治性因素投票，但大部份的婦女教育程度較低，因此較容易受非政治性因素的影響而投票；而在一黨支配的政黨體系中，或在具有既成優勢政黨的政黨體系中，由於其社會基礎遠較其他黨派深厚，在支持者的自願性動員下，勢必掌握最大比例的婦女選票；而其他小黨派對婦女的影響力自然相對減弱。經由這項觀點的補充，我們對婦女選民投票的性質及意義，即有更符合客觀事實的理

解。年齡與黨派選擇：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 ($\chi^2 = 12.068$, d.f = 2, $p < .01$)。年輕的選民很明顯地較年長的選民支持傾向政治改革的無黨籍候選人。而年長的選民亦很明顯地較支持既成優勢的國民黨。我們從進一步的分析中可知，在 55 歲以上的選民當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90.79%，在 35 ~ 54 歲當中的選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87.17%；在 35 歲以下的年輕選民當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佔 79.53%。此外，在 35 歲以下的選民，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佔 20.47%；在 35 ~ 54 歲之間的選民，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佔 12.83%；在 54 歲以上的選民當中，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則僅佔 9.21%。我們若再依據年齡變數，進一步對兩個政治團體的支持者作內部的剖析，便得到以下的發現：在國民黨候選人的支持者當中，35 歲以下的年輕選民佔 41.43%；35 ~ 54 歲的選民佔 34.44%；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24.13%。在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當中，35 歲以下年輕的選民佔 58.65%，35 ~ 54 歲之間的選民佔 27.88%；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13.46%。根據上述分析來比較兩個政治團體的支持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輕的一代（35 歲以下），共佔了約五分之三。而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在年齡分配上較趨平均。雖然 35 歲以下年輕的一代仍佔有最高的比率，但 35 歲以上的選民，則佔有總數的約五分之三。年齡的差異所產生不同的黨派選擇模式，究竟是何種原因所造成的？是「生命循環」的現象呢？還是「政治世代」的影響？先從「生命循環」的觀點看，這種現象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的現象。年輕的一代目前較明

顯地傾向支持強調改革的無黨籍候選人，但逐漸地，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地位的提高、家庭的建立，便將轉趨保守而支持既成優勢的國民黨。但若從「政治世代」的觀點看，這種現象所顯示的是：較高層次的衝突不會因歲月的流逝而有機械性的改變。衝突的根源，係來自於代間政治目標與價值取向的根本差異，相當不易化解。隨着時間的消逝，年輕的一代取代年長的一代，是必然的趨勢，政治體系亦將因此產生重大的變遷。

然而，究竟那一種觀點較正確，在缺乏進一步資料的情況下，我們頗難遽下斷語。一般說來，在社會及政治結構發生變遷的國家中，教育程度是影響變遷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們現控制教育程度的變數，再進一步觀察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聯（見表四），而得到如下的發現：

①在高等教育程度的選民當中，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不具有顯著的關聯 ($\chi^2 = 4.545$, $d.f = 2$, $p > .05$)，儘管從整體的趨勢上看，愈年輕的選民愈具有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傾向。

②在中等教育程度的選民當中，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 ($\chi^2 = 8.224$, $d.f = 2$, $p < .05$)。年輕的選民比年長的選民，更明顯地傾向支持無黨籍的候選人。反之，年長的選民比年輕的選民，更傾向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③在低教育程度的選民當中，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 ($\chi^2 = 7.219$, $d.f = 2$, $p < .05$)。愈年輕的選民比年長的選民，更明顯地傾向支持無黨籍的候選人。反之，則較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除此之外，我們尚可根據教育、年齡與黨派選擇等三項變數，對國民黨與無黨籍的候選人的支持者，作進一步的剖析：

表四：教育、年齡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檢定

		高 等 教 育 程 度					中 等 教 育 程 度					低 等 教 育 程 度				
		20 ~ 34	35 ~ 54	55 以上	20 ~ 34	35 ~ 54	50 以上	20 ~ 34	35 ~ 54	55 以上	20 ~ 34	35 ~ 54	55 以上	20 ~ 34	35 ~ 54	
國 民 黨	121	72	36	85	66	49	27	57	51							
	52.84	31.44	15.72	42.50	33.00	24.50	20.00	42.22	37.78							
黨 派 選 擇 外	86.43	92.31	97.30	77.27	86.84	94.23	62.79	81.43	83.61							
總 數	1400	78	37	110	76	52	43	70	61							
χ^2										$\chi^2 = 7.219$, d.f = 2						
										p < .05						

①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方面，可再分三點加以分析。
 (a)在高等教育程度的支持者當中，35歲以下的選民佔 52.84%；
 35～54 歲的選民佔 31.44%；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15.72%。(b)
 在中等教育程度的支持者當中，35 歲以下的選民佔 42.5%；35
 ～54 歲之間的選民佔 33%；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24%。(c)在低教
 育程度的支持者當中，35 歲以下的選民僅佔 20%；35～54 歲
 之間的選民佔 42.22%；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37.78%。

②在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方面：(a)在高等教育程度的選民
 當中，35 歲以下的選民佔 73.08%；35～54 歲之間的選民
 佔 23.08%；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3.85%。(b)在中等教育程度的
 選民當中，35 歲以下的選民佔 65.79%；35～54 歲之間的選民
 佔 26.32%；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7.89%。(c)在低教育程度的
 支持者當中，35 歲以下的選民佔 41.03%；35～54 歲之間的選民
 佔 33.33%；55 歲以上的選民佔 25.64%。比較以上兩組資料，
 我們獲如下的發現：

①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具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
 年輕的選民佔最高的比率；但具低教育程度的年輕選民所佔的
 比率則最低，僅有五分之一。並且，隨着教育程度的降低，年輕選
 民所佔的比率也隨之降低。反而，隨着教育程度的降低，年長選
 民的比重却跟着提高。

②在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中：具各層級教育程度的年輕選
 民皆佔有最高的比率；尤其是具高等教育程度的年輕選民所佔比
 率高達 73.08%。但隨着教育程度的降低，年輕選民的比重也隨
 之下降；年長選民的比重，則隨之提高。

根據以上對教育、年齡及黨派選擇的分析與發現，我們得到
 一重要的結論，即：教育對不同年齡選民投票行為模式的影響力不

盡一致。教育對年輕選民的黨派選擇行為影響最大，對 35 ~ 54 歲選民的影響較次，而對 55 歲以上年長選民的影響最弱。儘管在高教育程度的選民當中，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並無顯著的關聯，但根據上述的比較，可以發現高等教育程度的年輕選民，在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傾向上，逐漸有增強的趨勢。綜合說來，教育對不同年齡的選民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但即使如此，在控制教育變數之後，仍可發現年齡與黨派選擇之間存有顯著的關聯。這些皆顯示代間的差異不完全是教育的影響，而很可能是政治態度也居中發生影響。

(二)省籍與黨派選擇：

省籍的因素是否影響選民的黨派選擇？本省籍選民的黨派選擇模式與外省籍選民有何不同？假如有不同的話，是怎樣的不同？為何會有不同？這種不同是否具有實質的政治意義？換言之，對政治體系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我們先就省籍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連，作卡方 (χ^2) 的檢定如表五。

表五：省籍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檢定

		省	籍
		本省	外省
黨 派	國	291	288
	民	50.26	49.74
	黨	75.98	95.68
選 擇	黨	92	13
		87.62	12.38
	外	24.02	4.32
總 數		383	301

$$\chi^2 = 50.347, \text{ d.f} = 1, p < .001$$

根據表五，我們發現省籍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其顯著的的關聯性 ($\chi^2 = 50.347, d.f = 1, p < .001$)。本省籍選民遠比外省籍選民更支持黨外候選人；而外省籍選民遠比本省籍選民更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當中，本省籍選民與外省籍選民約各佔一半。而支持黨外候選人的選民當中，本省籍選民所佔比率高達 87.62%，已接近十分之九；而外省籍選民僅佔 12.38%。

從這些發現，我們可以了解到省籍對選民的黨派選擇具有很重要的影響：本省籍選民較支持黨外，外省籍選民較支持國民黨。但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本省籍選民當中，也有 75.98% 是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換言之，國民黨的社會基礎相當穩固，支持者均勻地來自本省人與外省人，而非集中在一特定的社會團體。反觀黨外候選人的支持者，却集中在本省籍的選民，來自外省籍選民的支持則相當少。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並重視的現象。

我們可以分從兩方面來解釋這種現象。首先，從政見態度來看，外省籍選民的政見態度傾向於強調對權威當局的認同、系統的安定、社會和諧與秩序的維護，贊成言論自由的限制、漸進的民主、政治權力的集中等等；而本省籍選民，相對之下，較不強調這些價值，較主張開放言論自由、基本人權的保障、參與的擴大、政治的制衡、提高本省人的地位與影響力等等（胡佛，1982：158～178）。換言之，在相當程度上，外省籍選民與本省籍選民所追求的政治價值有很大的出入，並且有牴觸的現象。再進一步看，執政的國民黨所代表的是對系統安定的追求及政治現狀的維護，不主張對政治作較大幅度的變革；而黨外候選人，則是政治現狀的批判者，所扮演的是一種非正式反對黨的角色，所注

重的是抨擊執政黨施政的缺失，尤其是主張貫徹基本的憲政規範，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政治價值，而與現實戒嚴體制下的政治行為規範呈對應的態勢。因此，黨外候選人的支持者，自然絕大多數是來自本省籍選民，而很少來自外省籍選民。但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則有半數是本省籍選民，這應作何解釋？我們的看法是，對以政治系統為取向的本省籍選民而言，主張在現階段貫徹憲政的基本規範的，相較之下，仍屬較少數；多數本省籍選民還是傾向系統安定、和諧的態度。因此，在本省籍選民當中，乃有四分之三左右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除此之外，在外省籍選民當中，共有 95.68 % 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而只有 4.32 % 支持黨外候選人，這種現象除了可歸諸政見態度的影響外，外省籍選民對黨外政治運動的本質、目標的疑慮，及對黨外試圖達成目標的作法的不滿，也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對這種現象，我們不可完全從政見態度或民意的角度來加以解釋。事實上，政見取向或系統取向的選民固然對選舉結果有很重要的影響，但非政見取向的選民在所有選民當中却佔有更高的比率（約五分之三左右），這對選舉結果反而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胡佛，游盈隆，1983）；而爭取最多這類選票的決定因素，即在於組織力量的大小與選民過去投票的習慣。以現階段的選舉來說，國民黨的組織及動員力量，遠過其他的競爭團體，且絕大多數的候選人，皆屬國民黨籍；非國民黨籍候選人所佔的比率既低，也缺乏有效率的組織，因此，除了靠爭取系統取向的選民外，對非系統取向選民的爭取，即感到十分的困難。再者，國民黨三十幾年來一直是最大的政黨，在歷次選舉中，皆佔有絕對的優勢，許多選民長期地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久而久之乃成爲一種習慣，除非有特殊重大事件的影響，這種「例行的投票行

「爲模式」是不容易改變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對省籍因素影響選民黨派選擇的現象，即有較接近事實的了解。不過，目前黨外候選人的支持者約十分之九是來自本省籍選民，這可能對政治體系發生很重大的影響。現可分三點加以說明：

(1)這會強化地域認同的感情，昇高省籍意識。黨外政治運動的領導者與支持者，絕大多數爲本省人士所組成，並且所進行的現階段的政治運動又被視爲政治過程中的逆流，而使其領導者與支持者懷有高度的不安全感，在這一狀況下，很容易因自身很明顯的共同社會特質——同省人，而團結起來，從而強化了對地域的認同，提升了省籍意識，進而也孕育出休戚與共，共同對外的「我群意識」，降低對系統權威當局的支持。

(2)絕大多數爲本省人士所推動的黨外政治運動，在本質上，很難不使以外省人爲主的權威當局心懷疑懼，而思處處加以防患。這當然會使黨外政治運動遭受更多的挫折，並促使政治競爭的情勢轉趨緊張、激烈。

(3)在以上兩種情勢的相激相盪下，很可能造成政治的惡性循環。黨外政治運動若迭受挫折，可能會促使地域認同的感情高張，而這種情況正是權威當局所最不樂見的，這種複雜的交互作用，不僅將使民主、自由與人權理想的實現更形困難，同時很可能會進而導致系統的不安，並促使系統內非理性力量的抬頭。

總而言之，我們認爲，以絕大多數爲本省人士所組成的黨外政治團體及其支持者，其本身即是易引起體系內政治競爭情勢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在高、中、低三種不同教育程度

的選民當中，省籍是否仍然是影響黨派選擇的重要變數。根據表六，我們發現省籍的影響仍然很大，並不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不同。現再分三點加以說明：

(1)在高等教育程度（即專科以上）的選民當中，省籍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關聯 ($\chi^2 = 15.65$, d.f = 1, $p < .001$)。本省籍選民比外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黨外候選人；而外省籍選民比本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2)在中等教育程度（即初中以上，高中以下）的選民當中，省籍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關聯 ($\chi^2 = 18.066$, d.f =

表六：教育、省籍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分析

		高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低等教育程度		
		本	省	外	省	本	省	外	省	
黨 派	國	84	145		101	103	105	33		
	民	36.68	63.32		49.51	50.49	76.09	23.91		
	黨	80.77	96.03		75.37	95.37	73.43	94.29		
選 擇	黨	20	6		33	5	38	2		
		76.92	23.08		86.84	13.16	95.00	5.00		
	外	19.23	3.97		24.63	4.63	26.57	5.71		
總 數		104	151		134	108	143	35		
χ^2		$\chi^2 = 15.6565$			$\chi^2 = 18.066$			$\chi^2 = 7.022$		
d.f		= 1			= 1			= 1		
$p <$		$.001$			$.001$			$.01$		

1, $p < .001$)。本省籍選民比外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黨外候選人；而外省籍選民比本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3)在低等教育程度(即小學以下)的選民當中，省籍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chi^2 = 7.022$, d.f = 1, $p < .01$)。本省籍選民比外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黨外候選人；而外省籍選民比本省籍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由此可知，教育並沒有削弱省籍因素對選民黨派選擇的影響。省籍因素不僅強而有力地影響選民的黨派選擇，同時，這種影響力，相當獨立，不受其他個人背景因素的影響。

四 教育與黨派選擇：

我們的研究亦發現，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關聯，卡方(χ^2)檢定可見表七。

從表七可知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較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較支持黨外候選人。

但從省籍與黨派選擇的卡方檢定，我們發現省籍是影響黨派選擇的極重要變數。因此，我們推測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聯，很可能是省籍因素所造成的，於是我們乃控制省籍的變數，進一步觀察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的關係，結果可見表八。

從表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與黨派選擇的顯著關聯性，在控制省籍變數後，就消失了。現可再作兩點說明：

(1)在本省籍選民中，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沒有顯著的關聯($\chi^2 = 2.047$, d.f = 2, $p > .05$)。換言之，教育並不影響黨派的選擇。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固普遍來自各種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而黨外候選人的支持者也同樣是來自各個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並無特別集中在某個教育程度的選民。

表七：教育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檢定

		教 育 程 度			列總數
		高	中	低	
黨 派	國 民 党	229	204	138	571
	民 外 候 選 人	40.11	35.73	24.17	84.59
	黨 外 候 選 人	89.80	84.30	77.53	
選 擇	黨	26	38	40	104
	外	25.00	36.54	38.46	15.41
	外 候 選 人	10.20	15.70	22.47	
行 總 數		255	242	178	675
					100.00

$$\chi^2 = 12.145, \text{ d.f} = 2, p < .01$$

(2)在外省籍選民中，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幾無任何關聯：在每一教育程度的層級，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至少皆佔有 49 %以上的比率；而支持黨外候選人的非常少。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省籍實乃影響選民黨派選擇的最重要的變數，而教育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

五、職業與黨派選擇：

我們依據職業的性質，將選民的職業分為八類：

- (1)包括農民、漁民、鹽民、勞工等。
- (2)包括有公務員（公營事業人員）及民意代表。
- (3)為自由業，包括律師、醫師、工程師、會計師、新聞從業

表八：省籍、教育與黨派選擇的卡方 (χ^2) 檢定

	本		省		外		省 高等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黨 派	8.4	101	105	145	103	33	
	28.97	34.83	36.20	51.60	36.65	11.75	
	80.77	75.37	73.43	96.03	95.37	94.29	
選 擇	20	33	38	6	5	2	
	21.98	36.26	41.76	46.15	38.46	15.39	
	19.23	24.63	26.57	3.97	1.63	5.71	
總 數	104	134	143	151	108	35	

$\chi^2 = 2.047$, d.f = 2, p > .05 $\chi^2 = 0.2397$, d.f = 2, p > .05

人員及演藝人員等。

- (4)包括軍警、黨務、團務人員等。
- (5)包括教師、文化事業工作者及學生。
- (6)包括自營商、專業經理人員及工商機構的普通職員等。
- (7)家庭主婦。
- (8)其他職業：包括無職業，已退休及上述七類職業以外的職業。

我們將以(1)、(2)、(3)等符號代替以上八類職業，就職業與投票決定的關連作卡方(χ^2)檢定，結果如表九。

表九：職業與黨派選擇的卡方(χ^2)檢定

		職業							
		(1)	(2)	(3)	(4)	(5)	(6)	(7)	(8)
黨派	國民黨	37	69	35	30	59	148	121	68
	民主黨	6.53	12.17	6.17	5.29	10.41	26.10	21.34	11.99
	外選	72.55	93.24	85.37	100.00	93.65	79.57	80.67	90.67
選擇	黨外	14	5	6	0	4	38	29	7
		13.59	4.85	5.83	0.00	3.88	36.89	28.16	6.80
總數		27.45	6.76	14.63	0.00	6.35	20.43	19.33	9.33
$\chi^2 = 26.919$, d.f = 7 , p < .001									

根據表九，我們發現職業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關聯($\chi^2 = 26.919$, d.f = 7, p < .001)：不同職業的選民在黨派選擇上呈現非常明顯的差異。再進一步看，最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的選民是軍警、黨務人員、團務人員、公務員、教師、學生及文化事業工作者。而較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的選民，是勞工、農民（漁、鹽民）、自營商、工商機構的職員（包括專業經理人員與普通職員）、家庭主婦及自由業者。但從整體來看，則不論在何種職業的選民當中，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比率，大都超過十分之八以上，最低的比率，亦不低於十分之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相當普遍地分佈在各種職業之內，而支持黨外候選人的選民則將近 80 % 是來自自營商、工商機構的職員、家庭主婦及農工選民。

不同職業的選民會有不同的黨派選擇，其中原因究竟為何？我們可先從不同職業選民的政見態度來加以觀察，現特運用變異量分析對職業與一般政策取向、規範改革取向、系統安定取向、國家認同取向、地域認同取向等五種因素之間的關連作一檢定，如表十。根據表十，我們可作以下七點討論：

(1) 在農工選民方面：農工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與其他職業選民的態度沒有明顯的不同。在規範改革取向上，農工選民的態度有保守的傾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則有較明顯的負面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也有明顯的負面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農工選民有較強烈的正面傾向。從這些發現，我們可以了解農工選民較其他職業的選民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主要是基於對地域的認同及對權威當局的認同程度較低。

(2) 在自由業的選民方面：自由業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與其他職業選民的態度沒有明顯的不同。在規範改革取向上，自由業選民有很強烈的正面傾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亦有相當強烈的正面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仍具很強烈的正面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則較弱，與其他職業選民相較，差異很小。由此可知，自由

表十：職業與政見態度的變異數分析 (F 值)

政 策 策 策	一 般		規 範		收 取		統 系		國 同		家 取		域 向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 準 差	平均數	標 準 差	平均數	標 準 差	平均數	標 準 差	標 準 差	平均數	標 準 差	標 準 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差
I	-0.1053	1.0485	-0.3684	0.6840	-0.5263	0.6967	-0.4211	0.7685	0.3634	1.4225				
II	0.0370	1.1596	-0.3333	0.6794	0.1481	1.1670	0.2593	1.1298	0.0000	1.0742				
III	-0.1667	1.2673	0.5000	1.2432	0.3333	1.2309	0.5833	0.7930	0.0833	1.3790				
IV	-0.5714	0.8516	-0.2857	0.7263	0.0600	0.8771	0.5000	0.7596	0.0000	1.2403				
V	-0.0741	0.9168	0.1852	1.1107	0.2593	1.1298	0.0370	1.1923	-0.2593	0.8590				
VI	-0.2400	1.0113	0.1867	1.3120	-0.1733	1.0446	-0.0533	1.0120	0.0267	1.1267				
VII	0.0250	1.2087	-0.3500	0.9487	0.1500	1.1447	-0.3000	1.0178	0.0750	1.0952				
總 數	-0.1402	1.0626	-0.0421	1.0742	-0.0093	1.0674	-0.0093	1.0346	0.0280	1.1362				
F 值	0.794		2.569*		1.776			2.709*		0.592				

N = 214 * p < .05

業選民在態度上有矛盾的現象：既傾向於贊同憲政規範的落實，又強調系統安定的重要，並對權威當局有強烈的認同。由此可知部分支持黨外候選人的自由業選民，主要是為了贊同基本憲政規範的落實。但更多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自由業選民，主要是為了認同權威當局，並擔心系統安定的問題。

(3)在自營商及工商機構的職員方面：自營商及工商機構的職員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的態度上與其他職業選民並沒什麼差異；但在規範改革取向上，則具有較強的正面傾向。除此，在系統安定取向上，有輕微負面的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也有輕微的負面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則沒有明顯的正面或負面傾向。由此可知，這類選民較其他職業選民，除了農工選民之外，較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主要是基於贊同基本憲政規範的落實。

(4)家庭主婦的選民方面：家庭主婦的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有較明顯的正面傾向；在規範改革取向上，却有強烈的負面傾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則有輕微的正面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又有明顯地負面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也有輕微的正面傾向。由此可知，家庭主婦選民亦較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基於地域認同的感情。

(5)在教師、學生及從事文化事業的選民方面：這類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的態度上與其他職業的選民並無何差異。在規範改革取向上，有明顯地正面僅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則有更強烈的正面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則無明顯的強弱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則有強烈的負面傾向。由此可知，這類選民較其他職業的選民傾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主要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很強調系統安定的價值，另方面又有強烈排斥地域認同的傾向。因此，儘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贊同基本憲政規範的落實，但最

終還是較傾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

(6)在軍警、黨務、團務人員方面：這類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有明顯的負面傾向；在規範改革取向上，有很強烈的負面傾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則無明顯強弱的傾向；但在國家認同取向上，有非常強烈的正面傾向；在地域認同取向上，則無明顯的強弱傾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類選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主要原因即在這類選民一方面非常強烈地認同於權威當局，另一方面則又明顯地排斥基本憲政規範的落實。

(7)在公務員選民方面：這類選民在一般政策取向上，有最強烈的正面傾向；在規範改革取向上，也有很強烈的負面傾向；在系統安定取向上，也有明顯的正面傾向；在國家認同取向上，亦有相當強烈的正面傾向；但在地域認同取向上，並無明顯的強弱傾向。由此可知，這類選民之所以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主要是因一方面強烈地認同於權威當局，強調系統的安定，另一方面排斥基本憲政規範的落實。

以上我們是從政見態度或民意的角度來解釋不同職業選民的黨派選擇。當然這樣的解釋，可能只說明了部分的原因，因為如前所述，有五分之三選民的投票行為是不能或不能完全從政見態度的角度加以解釋的。

（六）綜合分析：個人背景的政治傾向指標與黨派選擇

我們所建立的「政治傾向指標」，乃是由省籍、教育、職業等三項變數組合而成。根據我們上述的分析，本省籍選民比外省籍選民更支持黨外候選人，外省籍選民比本省籍選民更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而且，儘管在控制省籍變數後，教育與黨派選擇之間即沒有顯著的關聯，但在整體趨勢上，教育程度愈高者仍有愈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傾向。此外，在職業方面，我們也可清楚地發

現，某類職業的選民較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而某類職業的選民較可能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明顯的傾向，即所從事的職業與黨政關係愈密切的，愈傾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而所從事的職業與黨政關係愈疏遠的，則愈傾向支持黨外候選人。我們即可根據這項標準，將職業分成三類：

- (1)與黨政關係最密切的職業：軍警、黨團人員、公務員、民意代表、教師、學生及文化事業工作者。
- (2)與黨政關係次密切的職業：自由業、自營商、工商機構的職員。
- (3)與黨政關係最疏遠的職業：勞工、農民（漁、鹽民）、及家庭主婦。

如此乃構成三種等級；第(1)類職業，我們給 3 分；第(2)類職業，我們給 2 分；第(3)類職業，我們給 1 分。此外，教育程度也可劃分為三等；專科以上教育程度，我們給 3 分；初、高中教育程度，我們給 2 分；小學以下，則給 1 分。最後，對於省籍的測量，可分本省籍與外省籍；外省籍給 2 分，本省籍給 1 分。

以上三項變數組合之後，又可將選民分成六個大類，實際上包含十類不同特質的選民：從得分最低的（3 分）本省籍且低教育的農、工、家庭主婦選民到得分最高的（8 分）外省籍且高教育的軍、公、教、大學生、黨團人員選民。我們的假設是：得分愈高的愈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得分愈低的愈支持黨外候選人。皮爾遜相關分析顯示，政治傾向指標與黨派選擇之間具有極顯著的負相關 ($\chi^2 = -0.190$, $p < .001$)：在政治傾向指標上得分愈低的，愈支持黨外候選人；得分愈高的，愈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此證實了我們的假設。根據這項政治傾向指標，我

們可以用來解釋，甚至作某種程度的預測，不同特質選民的黨派選擇或投票決定。

五、結論

從以上的各項發現與分析，我們覺得台北市選民在民國六十九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中所作的黨派選擇，無論在政治發展及選舉行為的理論探究上，皆具有相當的意義。現再作數點綜合的說明與討論：

(一) 西方民主國家具有政黨政治長期交互運作的傳統，所以西方學者易於從政黨看選民，並發展概念架構，探控行為的理論。他們所強調的社會互動、政黨認同，或問題取向等中心概念，在前提上，實際皆已肯定政黨運作的傳統結構。換言之，他們是在這一穩定的結構內，進行選舉行為的觀察的。我國的情況則不然；近年來我們雖然已舉辦選舉，但政黨交互運作的傳統，尚未形成，因之，我們對選舉行為的探究，不僅要從政黨看選民，還要從選民看政黨，看整體政治體系的發展。這也就是說，我們所要看的是選舉在體系內 (*within the system*) 及對體系本身 (*of the system*) 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性質上是一互動的作用，而中心的概念則是體系的運作與發展。在這樣的認識下，我們乃試建以體系的認同、規範及決策為基礎的概念架構，一方面觀察有關的政見及所產生的衝擊，一方面辨識非政見的取向及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在這一架構的運用下，已可發現政見的及非政見的投票取向，已相當具體地反映出政黨政治交互運作的明顯形象。在選民的觀念中，無論是執政的國民黨或無黨籍的黨外人士，皆是具有某些特質的政治團體。我們認為這一觀念，縱然與政治的現實不盡相符，如黨外即仍非嚴格意義的政黨，但會推動政黨政治的發展，特別對黨外人士的整合，可能具有凝聚及導向的

作用。

(二)據我們上述的概念架構觀察，即可很清晰地發現，國民黨籍及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對政治體系的一般公共政策，並無取向上的差異與衝突。雙方的差異主要出現在認同與規範。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取向於國家的統一、戡亂及戒嚴時期的政治體制、社會秩序與有限度的自由，以及鞏固領導中心等；而支持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則較取向於地域的認同、人權的保障、參與的擴大，以及制衡力量的建立等。這些差異關係到體系本身的結構與整合，如不能妥善解決會導致體系的緊張與不安。因之，如能按憲政體制，作適度的調整，應有助於未來政治的和諧與進步。

(三)在非政見的取向上，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着重候選人非政治性的特質，如品德等，而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則較重視候選人政治性的特質，如勇於批評等，亦即較強調與政見有關的政治倫理。由此可知無黨籍候選人的支持者較具政治性。大致看來，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較富現實感，而無黨籍的則較富理想性。這些可能對未來的政治運作具有挑戰性。

(四)個人的背景因素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國民黨籍及無黨籍候選人支持者的決定。非常明顯地，無黨籍候選人遠較國民黨籍後選人受到本省籍選民的支持，而較少獲得外省籍選民的選票；而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省籍方面，則較為平均。另無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在教育程度上較低，但年齡則較輕，且多從事工、農的基層工作。國民黨籍候選人的選民則多中產階層的人士，教育程度亦較高，但年齡則較長。這些可能使得黨外候選人一方面注重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則重視年輕的及基層的選民。

註解

- 註一：選舉雖是一種衝突，但所根據的規則如具公正性，而能為民衆視為正當，即能和平加以解決，而導致和諧。社會的利益衝突會不斷產生，如選舉能不斷舉行，即既可在競爭中獲得進步，也可在變動中獲得和諧（參見：胡佛，1983：1）。
- 註二：Campbell 等學者（1960：531～538；1966：63～77）在政黨認同的概念下，將選舉劃分為：「維持性的」（*maintaining*）、「偏離性的」（*deviating*）及「重組性的」（*realigning*）等三種類型，並進而指出「維持性的」選舉的主要特性是：原先的政黨認同模式不變，仍由多數黨贏得選舉；「偏離性的」選舉的主要特性是：原先的政黨認同模式維持不變，但由於短期因素的影響，使少數黨贏得選舉；「重組性的」選舉主要特性是：主要政黨的社會基礎發生重大的變動，而失去原先保持的均勢，使得選民的認同模式產生重組的現象，如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經濟大恐慌時期即是。
- 註三：Campbell 等學者所發展的漏斗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bility*）是將選民的投票取向區分為政治性與非政治性，以及個人的與外在的兩個面向，然後再在時間的主軸上觀察兩個面向所交互形成的四種投票決定的過程與態度，而整體架構的重心即為具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實際上他們所探討的仍在個人與政治的取向變數，也就是 Philip E. Converse（1975：113）所說的「近因且政治的變數」（*proximal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註四：Rusk (1982: 100, 104) 即強調不易解答問題的要素究竟為何，而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也並未完全解決這一問題。他的主張是重視「立場問題」(position issues)，並在測量時，列出候選人的競選政見，以探詢選民的「問題立場」(issue positions)。但他對所謂的「立場問題」究具有怎樣不同的政治特質，也未作概念上的釐清。

參考書目

- Abramson, Paul A.
 1975 *Generational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Heath.
- Aitkin, Don, and Michael Kahan
 1974 "Australia: Class Politics in the New World." In Richard Rose, eds. *Elector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Handbook*. New York: Free Press.
- Berelson, Bernard R., Paul E. Lazarsfeld, William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onverse, Philip E.
 1966 "The Concept of a Normal Vote." In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 Converse, Philip E.
 1975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Fri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Vol. 4, 75-170.
- Key, V. O.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zarsfeld, Paul E., Bernard Berelson, and Hegel Gaudet.

-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Arthur, Warran E. Miller, Alden S. Raine, and Thed A. Brown.
- 1976 "A Majority Party in Disarray: Policy Polarization in the 1972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753-778.
-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erce, Ray.
- 1981 "Left-Right Perceptions, Partisan Preferences,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nd Partisan Choice." *Political Behavior*. Vol. 3, 1: 117-134.
- Rusk, Jerrold G.
- 1982 "The Michigan Election Studi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Micropolitics*. Vol. 2, 2: 87-109.
- Schulman, Mark A., and Gerald M. Pomper.
- 1975 "Variabil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from Causal Mode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93-417.
- 胡 佛
- 1982 "政見取向的選民," 載: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1983 "動態的和諧," 中國論壇, 17卷2期, 頁1。
- 胡 佛,游盈隆
- 1983 "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 政治學報, 11期, 頁1-51。
- 游盈隆
- 1982 系統取向與投票行為, 台大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附錄一 抽樣的程序及方法

我們對選民投票的行爲觀察，是以台北市選民為對象。首先，我們根據台北市人口結構（省籍與職業的結構）、區域發展先後（包括區域結構的特質）及區域地理位置（如市區、郊區等）等三項標準，將台北市十六個行政區域中性質接近的分成一類，如此共分成三類。我們再從這三類區域當中，各擇一適當的行政區域，而共得三區，分別是大安區、龍山區、內湖區。三個行政區域選定後，我們再就這三個區域的選舉人名冊作系統的隨機抽樣，所獲得的樣本，即可代表全體台北市選民。在抽樣方法上，我們採取二段抽樣法（two phases sampling）。上述三區選民總數達廿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二人，我們根據三區人口的比率，各抽取廿五分之一，共得九千五百四十個樣本。這個樣本是我們第一段的樣本母體。然後，我們再根據第一段的樣本母體，依照系統隨機抽樣的原則，再取十分之一，共得樣本總數九百五十四個，作為實際觀察的對象。這種兩段抽樣法，可供給我們九倍的預備樣本，如遇到不能訪問的選民，就可隨機作多次的補充抽樣，這是本研究在抽樣上的一項特色。

在抽出實際要觀察的對象後，我們隨即在民國七十年二月中旬開始進行調查訪問的工作。我們的訪問是採取逐戶拜訪與面談。約經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初步的訪談始告結束。之後，研究小組的成員即對收回的問卷進行極為嚴核的檢查與整理，凡是不完整的或發現有問題的問卷，即予挑出，作第二次的再訪。經再訪的樣本高達四百份左右，約佔投票樣本總數的百分之五三。這項再訪工作，在四月上旬展開之後，於六月初始告完成。我們在設計研究時，特別感覺研究的信度十分重要，這對敏感度較高的政

治行為的研究尤為必要。當時研究小組雖感覺儘管作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的檢定相當費時、費力，成本也高，但我們仍在再訪工作進行的同時，在投票選民的有效樣本（七百五十四）中，隨機抽取其中百分之十五，作再測信度的檢定。我們所獲的信度係數超過 0.8，可見信而可徵。

當整個再訪工作結束之後，研究小組再一次對所有問卷進行審慎的最後檢查，剔除其中十七份有問題的問卷，共得九百三十七份有效問卷，包括投票樣本七百五十四份，不投票樣本一百八十三份。整體說來，在九百五十四份預期收回的問卷中，有效問卷所佔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八·二二。

附錄二 量表的編制與測量

我們共編製了政見取向及非政見取向的量表。由於影響選民投票的變數很多，通常並不止一個，因此，首先，我們允許受訪者陳述一項至多項影響其投票的變數。其次，在受訪者陳述影響其投票的多項變數後，我們乃進一步請受訪者就影響其投票的多項變數，依個人自覺的重要性作先後次序的排列。當然，受訪者也很可能難分重要性的軒輊或感覺其中的兩項或三項乃同等重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也允許受訪者作同等重要的排列。第三，多重選擇與重要次序的排列，皆運用到各類變數的施測。唯對政見態度的施測，除了多重選擇與重要次序的排列等兩種方法外，尚運用「李克特測量法」(Likert scale)。受訪者對候選人的政見，可有強烈贊同、中度贊同、輕微贊同、輕微不贊同、中度不贊同及強烈不贊同等六種不同強度的正面或負面的反應。強烈贊同的，給六分，強烈不贊同的給一分。介乎其中的，則分別給與五、四、三、二等分數。基本上，多重選擇亦是一種「是或不是」的問題。例如，當受訪者被問及，為何投票支持所選舉的候選人？他很可能說出多種原因，如候選人的政見、成就、品德、學識等等，而非由於家人或親友的囑託等。換言之，多重選擇所獲得的資料，是一種類名尺度 (nominal scale)。若再進一步將多項變數作重要先後次序的排列，由此所得到的資料則係次序尺度 (ordinal scale)。但就重要性的高低延續的意義上來看，我們也可以視作一種等距的尺度 (interval scale)。

我們利用「社會科學套組程式」(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簡稱 SPSS) 及「生統電腦程式」(Biomedical Computer Programs P-Series 簡稱

BMDP)，進行統計分析。所運用的統計方法包括皮爾遜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變異數分析(Anova)、多變項列聯表分析(multi-variate contingency table)、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等。

我們對選民的整體投票取向，共列二十四個選擇題及一個任意回答題。針對這些題目，我們在訪問時，共詢問兩個問題：（先問第一題，再續問第二題）。

(1)您選舉他（她）為立法委員，一定是有道理的；請您仔細地想一想，最後您為什麼投票給他（她）？

(2)請問在您所選舉的投票原因中，那一種（或那幾種）是最重要的、或次重要的等等。（請用 1 2 3 4 等數字說明；同等重要的，請用相同的數字）

各項選舉題目如下：

甲、私人關係：

1.由於家人或親戚的囑託。

2.由於朋友或同學的囑託。

3.由於師長（或長輩）的囑託。

4.由於鄰居的囑託。

乙、由於所服務機關同事的囑託。

5.由於所服務機關同事的囑託。

6.由於所參加團體會友的囑託。

7.由於是同鄉。

8.由於是同宗。

9.由於是校友。

丙、政治關係：

- 10.由於黨團組織的囑託。
- 11.由於他（她）是同黨黨員。
- 12.由於他（她）是無黨籍人士。
- 13.由於後備軍人組織的囑託。
- 14.里鄰長的囑託。

丁、選候人的政見：

- 15.由於他（她）的政見或解決問題的辦法。
- ▲若是依政見投票，則繼續回答政見量表（見後）。

戊、候選人的條件：

- 16.由於他（她）的品德。
 - 17.由於他（她）過去的表現或成就。
- ▲若是依表現或成就投票，則繼續回答表現及成就量表（略）。
- 18.由於他（她）所經歷的遭遇。

- ▲若是依候選人的遭遇投票，則繼續回答同情量表（略）
- 19.由於他（她）的家世很好。

- 20.由於他（她）的學識。
- 21.由於他（她）的風度。
- 22.由於他（她）敢作敢當的勇氣。

己、個人的因素：

- 23.由於想發抒內心的情緒。
- ▲若是為發抒內心的情緒而投票，則繼續回答情緒量表（略）

- 24.由於個人特別利益的考慮。
- ▲若是因個人特別利益的考慮而投票，則繼續回答利益量表（略）

庚、

25. 其他或特殊事例（請註明 _____）。

政見量表的各項題目如下：

- 1 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 2擁護政府，光復大陸。
- 3爭取本省同胞的地位與榮譽。
- 4鞏固領導中心，維護政治安定。
- 5反對官僚政客的政治特權。
- 6全面擴大政治參與，增加民意代表的選舉名額。
- 7依據國情，逐步實現民主。
- 8放寬言論尺度，爭取言論自由。
- 9維持社會和諧，嚴禁不當言論。
- 10改善審判的公平與獨立，以確保人權。
- 11維護社會秩序，反對暴力政治活動。
- 12建立制衡力量，防止政治腐化。
- 13集中政治權力，強化行政效能。
- 14提高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 15大量興建國民住宅，使住者有其屋。
- 16澄清吏治，肅清貪污。
- 17縮短貧富差距，改善低收入民衆生活。
- 18實施全民失業及醫藥保險，加強社會福利。
- 19妥善照顧退役官兵、後備軍人及軍眷生活。
- 20其他（請註明）。

附錄三 選民的個人背景：次數及百分比

	次數 (n)	百分比 (%)
性 別		
男	393	52.47
女	356	47.53
年 齡		
20 ~ 29	215	28.52
30 ~ 39	180	23.87
40 ~ 49	120	15.92
50 ~ 59	133	17.64
60 以上	106	14.05
教 育		
大 學 以 上	159	21.66
專 科	101	13.76
高 中 (職)	172	23.43
初 (國) 中	90	12.26
小 學	138	18.30
識 字 未 入 學	23	3.13
不 識 字	51	7.46
省 籍		
本 省	437	58.27
外 省	313	41.73
居 住 地		
大 安 區	505	68.00
龍 山 區	103	13.86
內 湖 區	135	18.14

附錄四 選民的態度取向：次數、百分比 及次序

	次數 (n)	百分比 (%)	次序
1 候選人取向	444	58.9	1
(1) 成就取向	292	38.7	1
(2) 品德取向	184	24.4	2
(3) 學識取向	148	19.6	3
(4) 風度取向	88	11.7	5
(5) 胆識取向	71	8.4	6
(6) 同情取向	39	5.2	10
(7) 家世取向	13	1.7	17
2 政見取向	292	38.7	2
3 黨政取向	158	21.0	3
(1) 黨團囑託	100	13.3	4
(2) 政黨認同	53	7.0	7
(3) 里鄰長囑託	21	2.8	14
(4) 黨外取向	13	1.6	20
(5) 後備軍人組織囑託	5	0.7	17
4 私人關係取向	129		4
(1) 家族囑託	88	11.7	5
(2) 同輩團體囑託	33	4.4	11
(3) 鄰居囑託	24	3.2	13
(4) 師長囑託	12	1.6	18
5 社會關係取向	76	10.0	5
(1) 同事囑託	25	3.3	12
(2) 同鄉囑託	24	3.2	13
(3) 團體會友囑託	18	2.4	15
(4) 校友認同	16	2.1	16
(5) 同宗認同	8	1.1	19
6 個人因素	74	9.8	6
(1) 發抒情緒	51	6.8	8
(2) 利益考慮	44	5.8	9

N = 754

AN ABSTRACT

THE PARTISAN CHOICES: AN ANALYSIS OF VOTERS'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S

by

Fu Hu Ying-lung Yu

The major attempt of the author in this study was trying to construct an empirical theory concerning the partisan choices of voters through an observation to their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s of a sample of 754 voters of Taipei in the 1980 legislatorial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voters' attitudes into orientations of issue, candidate, and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voters' backgrounds were divided in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including sex, age, birthplac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authors can be briefly stated as follows:

1. In view of orientations of issue, the voters for the Nationalist candidates and those for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uch issues of national idendity, basic human righ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policy issues, such as housing, medical care, social insurence, and public employee's salary.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of ours were, in nature, *of the system* rather than *within the system* as usually seen in the Western democratical countries.

2. With respect to orientations of candidate, and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 the voters for the Nationalist candidates put more emphasis on personal virtues and those for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payed more sympathy to personal suffers, more praise to brave criticisms, and more attention to ideas of family members.

3. As for the voters' backgrounds,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won more support from Taiwanese than mainlan-

ders, but the nationalist candidates got rather even. In addition, the voters for the Nationalist candidates were comparatively high educated, belong to the middle class, but older.

